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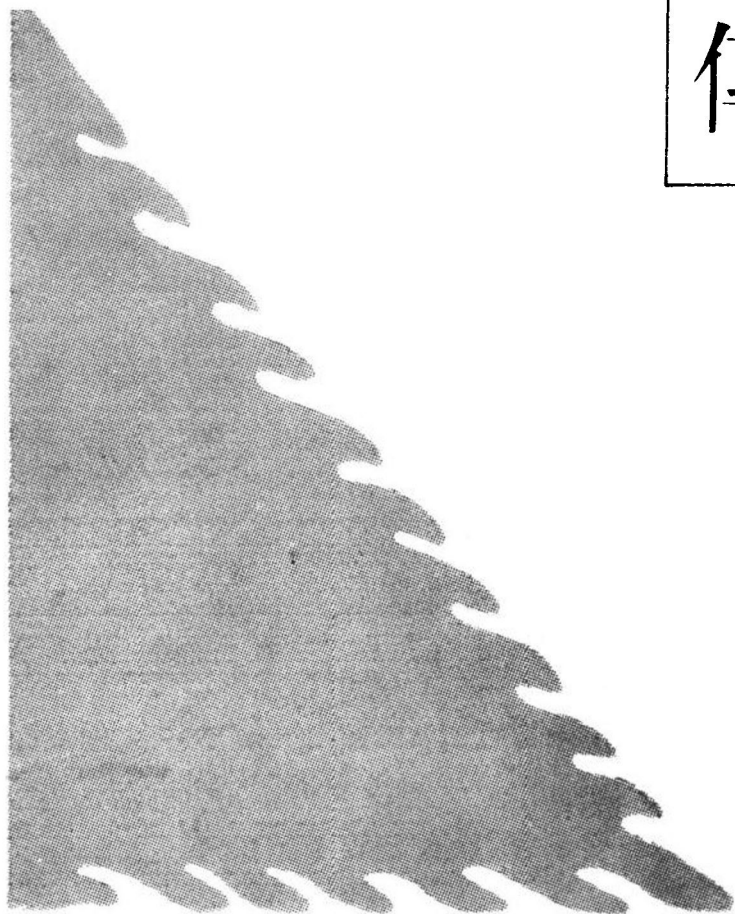
孫權傳

尹頌公◎著



孫權傳

尹韻公 ● 著



孙 权 传 · Sunquanzhuan

尹 韶 公 著

责任编辑：毛振家

封面设计：王 澍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5.5 印张 5 插页 124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印数：1—2 630册 定价：4.50元
吉林省新华书发发行 ISBN 7—80528—314—1/K·144

目 录

第一章 扰攘之际	(1)
一、风云壮图.....	(1)
二、孙氏兴起.....	(7)
第二章 统治之术	(16)
一、统事初期.....	(16)
二、最佳选择.....	(20)
(一) 政治上的宗族领主制.....	(21)
(二) 军事上的兵业世袭制.....	(23)
(三) 经济上的俸邑制.....	(25)
三、连姻结缘.....	(30)
四、君臣和谐.....	(33)
五、吴蜀异同.....	(41)
第三章 依违之间	(46)
一、吴魏之间.....	(49)
(一) 赤壁之战.....	(50)
(二) 合肥之战.....	(67)
二、吴蜀联盟.....	(73)
(一) 荆州之战.....	(76)
(二) 夷陵之战.....	(85)
三、夷陵战后.....	(92)
第四章 江南之辟	(103)
一、孙吴屯田.....	(105)

二、讨“逆”伐“贼”	(111)
三、峻法严刑	(123)
四、三箭齐发	(130)
五、定都南京	(138)
第五章 暮年之困	(144)
一、宫廷内争	(144)
二、性格特征	(153)
三、结语	(157)
附录:	
(一) 孙权执政年表	(164)
(二) 孙氏家族图	(167)
主要参考书目及论文	(168)
后记	(171)

第一章 扰攘之际

一、风云壮图

这是一个动荡、多乱的年代，严峻而又冷酷！

东汉末年，刘氏东汉政权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这场多病症的大发作，并非仅仅是气数已尽的在劫难逃，而是东汉帝国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矛盾斗争长期未得到根本解决的必然结果。本来，作为封建国家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从主观上说，它们是企望国家机器能够持久而稳定地为它们的统治目的和阶级利益正常地运行转动，一方面维护和巩固封建社会秩序，一方面履行其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的阶级工具职能；可是，从客观效果上看，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各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得这种主观企望不过只是一厢情愿而已，矛盾斗争的程度不断深化，广度不断扩大，必将促成地主阶级所不愿看到或始料不及的危机总爆发，摧毁它们自身的王朝。

我们知道，刘氏东汉王朝除了具有一般封建王朝所具有的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之外，还具有带着东汉王朝本身特点的地主阶级内部各社会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日趋激烈，反过来又加剧了外部的阶级矛盾的演化进程。从汉和帝永平四年（公元92年）起，东汉王朝开

始了外戚和宦官的相互争斗，每一方都力图单方面地控制最高领导权，斗争的方式和手段都是极其残酷的、你死我活的。以后的每一个皇帝登基，几乎都是外戚和宦官之间斗争而交替扶植的产物。上层统治阶级的互相倾轧，互相残杀，不但极大地影响着封建国家职能的正常发挥，而且还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平衡关系。东汉时期，封建国家的官僚阶层是由士大夫组合的政治集团构成的。这个政治集团无论在地方上，还是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拥有相当的优势。在他们眼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仕位理应是士大夫们所有的天然世袭领地，不容他人染指。这种状况，自西汉以来，就一直如此。可是，外戚或宦官的专政，却不断侵入他们的“地盘”，干扰着他们的仕途前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外戚或宦官在打倒对方之后，总要大力加封为新政权出力的追随者和响应者，悉心培植自己的势力，巩固和扩大获得的权势地位。例如，在宦官势力的极盛时期，汉朝政府的中央机关，概由宦官把持，宦官的父子兄弟甚至“并据州郡”，出任使史、太守^①。连拱卫首都新军的西园八校尉，也由宦官蹇硕担任首领，他还有权指挥天下军马。更有甚者，汉灵帝熹平年间，擅政的宦官公然在西园卖官，标价为：公，一千万；卿，五百万；地方官的郡守二千万，令为四百万。这就不但表明宦官公然藐视士大夫的存在，嚣张地侵犯了官僚士大夫集团数百年间一直享受的政治特权，使士大夫集团同宦官集团的矛盾，较之与外戚集团的矛盾，更加尖锐，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两汉以来的举仕制度。宦官集团在经济上的贪虐不亚于政治上的横暴。东汉末年的宦官头子张让就霸占了“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②，其他宦官自然就群起而效之了。不论是宦官当朝，还是外戚执政，只要他们上台，势

力大增，就自动地直接损害着士大夫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

“仁义陵迟，圣道渐坏”，这当然为士大夫集团所绝对不能容忍。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既反宦官又反外戚的生死斗争之中。他们认为，外戚和宦官的地位和权势不是通过合法的正常的途径所获得，而是左门旁入，故不屑于齿。士大夫集团仗着他们正统的地位和卫道士的面容，奋起与外戚和宦官抗争，要求恢复健康的察举制度，保证他们天然所属的政治利益，建立稳定的封建社会秩序。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事件，实际上就是地主阶级内部几个不同政治集团因政治利益和权力分配不当不均，所引起的尖锐冲突的表现。史载：官僚士大夫集团中，因受宦官迫害而横死狱中的有百余人，因牵连而被杀、徙、废、禁的达七八百人。无怪乎当时有人目睹政治昏暗，不由仰天叹息道：“天地闭，贤才隐。”^⑤需要指出的是，比起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来，由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经历、环境、教养和各种条件，使他们比较关心民瘼，也曾提出过一些符合实际的改良主张，喊出过一些体谅民情的高言。

毫无疑问，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具体表现在地主阶级的无限制地兼并土地和农民阶级的日益贫困化。一些有见识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意识到这种矛盾的不可避免性，因而比较明智地提出某些限制兼并土地的主张和政策，企图缓和矛盾的尖锐性。在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纳入正轨的情况下，这些主张和政策或许多少会得到一些贯彻和执行。可是当上层统治阶级忙于解决内部分争和陷于互相残杀，从而大大削弱国家职能的发挥之际，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便恶性发展，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剧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因而也加

速了农民起义的到来。封建政府一方面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即实际上放手土地兼并),另一方面又严禁地主、豪强大量地或过多地占有失去土地的国家编籍的农民,违者处以重罚。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只能使地主豪强不断地把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抛掷出生产领域而迫其沦为流民,促使流民的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人民到处流离失所,远走他乡,食草根啃树皮,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专心于外威和宦官之争而显得软弱无力的东汉政府对此束手少策,它既不可能取消土地的自由买卖政策,又不可能把国家掌握的农民统统奉送给地主豪强,以防壮其自大。只好采取徙民、赐公田、贷种粮、开仓放赈等办法,企图阻止在农民中日益增长的强烈不满。但此招也是杯水车薪,收效甚微,无法遏止劳动人民铤而走险,举行起义,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流民问题的社会化,造成了东汉末年黄巾农民大起义的前提和条件。它有力地表明了东汉政府的腐朽无能,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勇于决定自身命运的雄心和气魄,推进历史进程的雄心壮志!

封建国家的腐败衰朽,地主阶级的堕落无道,也直接毒化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人们的道德价值和生活观念也随之受到严重污染。东汉末年的地主阶级政论家王符在《潜夫论》一文里愤怒地谴责道:

“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怀丸挟弹,携手上山遨游,或好取土作丸买之,外不足御寇盗,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此皆无益也。”

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王符深为担忧。

作为地主阶级的忠实代言人，他不得不大声发出警告：

“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害。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者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徵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

然而，无论统治阶级的名士们多么明智，多么焦急，也无法抑压危机总爆发的到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王朝在内外打击下，迅即分崩离析。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农民大起义如火山般爆发了。它震惊了整个地主阶级，使他们从内部倾轧中清醒过来，意识到农民大起义已经威胁到整个阶级的利益，形势需要他们相互之间停止争斗，暂时妥协，以求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去对付黄巾起义。宦官集团虽然把持着中央大权，但缺乏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官僚士大夫集团虽有镇压能力，但又缺乏藉以号令四方的中央大权。因此，东汉政府被迫下令解除“党锢”之禁，以弥填官僚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的鸿沟，并大量启用官僚士大夫集团中的能臣干将，集中力量去扑灭农民起义燃烧的熊熊烈火，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王朝。

经过数年的艰难努力，好容易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还未待完全“荡平”，统治阶级内部又为争夺最高权力开始了新一轮互相残杀。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中坚人物、西园八校尉之一的袁绍借口当权的外戚被宦官们所杀，率兵

攻进宫中，大杀宦官，一举消灭了宦官势力，吐士大夫们胸中之大快，除百年之大患。可就在这时，如狼似虎的董卓率西北军闯进洛阳，攫取了汉廷中央大权。他杀士废帝的劣行，激起了袁绍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联合携手，汇集关东诸郡几十路人马，兴兵讨伐董卓。

祸乱之神再给已衰落得不能再弱的东汉王朝一记打击。董卓被司徒王允勾结董卓部将吕布杀后，董卓部下联袖攻击长安，杀王允，逼汉帝，胁百官。后因矛盾迭起，关东军和董卓残部厮杀，董卓残部内部互为水火，关东军内部亦混战不休。中原大乱，人民涂炭，九州鼎沸，国家播荡！

至高无上的皇帝威信下降到了极点。汉献帝被董卓部将李傕劫持出走，时盛暑热，皇帝向李傕求米五斛、牛骨五具，李傕竟拿去臭不可食的腐牛骨，皇帝本人已为鱼肉，只得忍气吞声，不敢发作^④。史称：“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诸将专权，或擅笞杀省书。司隶校尉出入，民兵抵掷之。诸将或遣婢诣省阁，或自赍酒啖，过天子饮，侍中不通，喧呼骂詈，遂不能止。又竟表拜营壁民为部曲，求其礼遗。医师、走卒皆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示有文字，或不时得也。”^⑤皇权衰落了，国家分崩了，政府瓦解了，社会败退了，人心涣散了，民俗堕落了，——黑暗来临了！

这场中国古代史上罕有的大混乱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其残酷程度恐怕丝毫不减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大混战。战争的浩劫，使国家元气大伤，使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足足倒退了好几个世纪之久！这种凄楚、扣魂、荒凉、恐怖、惊骇、愕惧、怵目、哀憾的血泪斑斑局面，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文人们。这些人间悲剧，便在他们所写的诗歌和纪事

中，得到了生动而真实的再现——

“铠甲生虱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王粲：《七哀诗》）

“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或骸余肉，臭秽道路。”（《晋书·食货志》）

“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魏志·武帝纪》中引《建安七年令》）

“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士叹于外，妇怒于室。”（《三国志·吴志·朱治传》注引《江表传》）

“是时蝗虫起，岁旱无谷，从官食枣菜。诸将不能相率，上下乱，粮食尽。……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三国志·魏志·董卓传》）

读之毛骨悚然，听之潸然泪下；默之情不敢发，思之心如刀绞。

二、孙氏兴起

这是一个历史召唤雄杰的时代，昂扬而又勃发！

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被地主阶级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因此熄灭，它仍在地下运行、奔突和集聚。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时由官僚士大夫集团

同宦官集团的尖锐冲突，演变为担任州牧太守的军阀之间的大混战。这个演变过程及其结果，是由于东汉政府为了镇压黄巾农民大起义而不得不加强各州牧太守的权力造成的。这些刺史、太守一旦拥有雄力之后，自然不肯轻易交出，个个自谓“命世之才”，人人想要割据称雄，至使中央大权旁落，地方坐大难除，战乱不已。曹丕在《典论·自叙》中曾说：当时“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⑥《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吴录》也说：“是时关东州郡，务相兼并，以自强大。”我们注意到，在担任州牧太守的军阀群中，几乎全是官僚士大夫集团出身的人，如益州牧刘焉、荆州牧刘表、冀州牧韩馥、渤海太守袁绍、徐州刺史陶谦、幽州太守公孙瓒、河内太守王匡、并州刺史高幹、兖州刺史刘岱、东郡太守桥瑁、南阳太守袁术等。这些州牧太守中，有的是早就看出危机端倪，“欲避世难”，自愿外放为官的；有的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有的是在官僚士大夫集团自相残杀中发迹的。豪雄角逐，分裂疆宇。当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政治利益受到宦官集团的吞蚀时，他们便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架子，高谈清明政治；而当他们握有一定权力后，便缄默闭口，再也不唱“清议”之歌了。实际上，他们危害作乱的破坏本领毫不弱于宦官集团。此一时也彼一时。

我们还注意到，黄巾农民大起义给东汉末年的社会带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变化，这就是地主阶级和地方豪强由对土地的兼并转为对人口的争夺。过去中央政府严禁地方豪强过多地占有户口，主要是惧怕地方豪强势气膨胀，妨碍中央的令行贯彻，故他们宁愿让破产无业的农民变成四处游荡的流民，也不愿他们依附于地方豪强大姓。地主豪强惧于政府法

令，亦不敢受纳和接收大量游民。黄巾农民大起义削弱了汉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力，也改变了旧况。地方豪强为了在动乱之秋中保住身家性命和保护家业不受侵犯，便大量招纳游民，变民为兵，割据一隅。江南地区众多的坞壁、族屯就是由此而来的。只有有了一定的武装力量，才有一定的安全感，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保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也才能从事更大的冒险。无疑地，地主阶级对人口的争夺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农奴制色彩加重。地主阶级加紧对人口的争夺，并不意味着他们转移了对土地兼并的兴趣，相反，谁拥有的人口越多，兵就越多，也就越有希望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产业。如果说从前的土地兼并基本上是以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和平方式进行，那末，现在则是以兵多马强的暴力行为进行。谁的力量强，谁就是老大。反过来说，农民和流民们为了使自己性命的安危和微薄的产业免遭兵荒马乱之劫，也愿意依附于某一地方豪强，以身份的自由换取生命的保障。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甘愿受地主阶级的奴役。这种“甘受奴役”的现象不独是东汉社会的特产，它也曾出现于欧洲中世纪的德国。当时德国的土地上，战争横行，混乱不已，“到处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夫”^①。受苦最深的农民为自身的利益驱使，不得不主动寻求封建主的保护，所以农奴制在西欧是普遍方式。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保护，还是遭到践踏，奴役依旧是奴役，甘受奴役的现象发生于整个中世纪。”^②恩格斯的这段论述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吴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大有帮助的。

历史上的大混乱总是催促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出场表演，

人人都有上台的机会，个个都有自己的一套表现手法和表演内容。有的如过客匆匆而晃；有的怀壮志而乏雄才；有的夺地为王，仅恋一隅；有的志在安邦定国，扶危济弱；有的审时度势，巧于周旋，善守一方。更多的下去了，上来的毕竟是少数。历史就是这般无情地不断淘出众多风流，显露出真正有本事的英雄豪杰。本书的主角——孙权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小心翼翼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留下了自己活动的深深痕迹的。

让我们先来简略地认识一下孙氏家族，这对我们了解孙权这个历史人物是十分必要的。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系孙权父亲，史称“孙武之后”^⑧。孙坚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少为县吏，后因多次在镇压黄巾农民大起义中立有战功，逐次升为别部司马，又封乌程侯。值董卓奸乱，专擅朝政，横恣京城。于是关东诸郡并兴义兵，以讨董卓。“最有忠烈”之称的孙坚亦仗义出兵，投奔袁术属下。袁术即表孙坚为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治兵于鲁阳城。始战梁东，为董卓军所破，孙坚险被虏获；继起阳人之役，孙坚大胜，斩董卓都督华雄。董卓畏惮孙坚猛壮，乃遣将军李傕等人前往求和亲之好，并许诺让孙坚子弟担任刺史、郡守等职，孙坚正色道：“卓逆天无道，荡履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⑨断然拒绝。看来孙坚并非重利轻义之辈。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遣孙坚征荆州，击刘表。襄阳之战时，孙坚轻敌大意，单马行砚山，为刘表军士所射杀，时年三十七岁，正值壮年。他留下五个儿子，依次为孙策、孙权、孙翊、孙匡，少子孙朗为庶出。长子孙策袭父位。

孙策，字伯符，其为人也，“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所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①。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随从袁术，袁术见孙策甚奇之，常叹曰：“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②按理讲，孙策袭其父位，其旧部也应归孙策统率掌握。然袁术不肯还其父兵，他要孙策自己去丹阳招募，孙策依行募得数百人，但为泾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于是再往见袁术，袁术这才把孙坚余部一千多人交给孙策掌管。孙策屡次为袁术立功，袁术也曾许诺给他太守一类之职，但始终不见兑现。孙策痛感鹏搏双翼，未展蓝天之志；寄人篱下，不得纵横之心；由是日益失望，急欲脱笼。这时，任丹阳太守的孙策之舅吴景、任丹阳都尉的孙策叔父之子孙贲皆被扬州刺史刘繇驱逐之，刘繇势力直抵袁术门下，引起袁术不安。孙策抓住这个机会，请求袁术道：“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招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君，匡济汉室。”^③袁术深知孙策恨他，也知道孙策竭力想摆脱他。放孙策走吧，恐一去不回；不放他吧，刘繇又打到自己家门口。权衡再三，袁术以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孙策夹在缝中，未必能够得志，不如放他出去，做个顺水人情。袁术乃表孙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给兵财千余，骑马数十匹，宾客愿随孙策者亦有数百人。

孙策杀回江东这着棋，几年前就考虑成熟，只待时机而择。远在居江都，未从袁术之前，孙策就拜访了避难江东的名士张纮，咨以世务。他说：“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张纮初虚以委辞，后见孙策忠壮内发，词令慷慨，感其志言，乃指点他道：“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

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⑭孙策且喜且悟。

孙策脱袁术之控，如龙入渊，似虎出山，沿途募兵，得五六千人，渡江转所，所向皆破，莫敢挡其锋；击严白虎于会稽，袭刘勋于庐江，杀许贡于吴郡，破刘繇于牛渚，攻陈瑒于海西，讨黄祖于夏口，俘祖郎于丹阳，廓定六郡，声冠中夏。而当时曹操的势力范围仅限于兖州一隅，论空间还不如孙策的地盘大，故曹操闻孙策平定了江南，意甚难之，常呼“猡儿难与争锋也”^⑮。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时袁术僭号，称帝于淮南。孙策得知，以书责之，趁此断绝与袁术的一切关系往来。孙策捍卫正统的大义举止，为汉政府所欣赏，曹操表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从此孙氏威震江东，形势转盛。为了进一步拉拢孙策，曹操还把其弟的女儿许配给孙策四弟孙匡，又为其子曹章娶孙策叔父之子孙贲的女儿，礼辟孙权和孙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孙权为茂才。曹、孙两家结为亲属之交，为尔后曹魏和孙吴的外交关系种下了微妙的种子。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当曹操和袁绍在官渡进行决定性会战之际，孙策不但不去援助他的半个亲家，反而还阴谋渡江北上，从曹操背后偷袭许都。曹操谋臣闻听皆惧，唯独郭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⑯郭嘉真乃料事如神，孙策不久果然被誓为吴郡太守许贡复仇的三个奴客所谋刺，伤重而逝，时年二十六岁。

孙策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为孙氏政权创基立事，粗定河山。孙策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地平定江南，为他